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双重逻辑

王飘怡

(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深刻体现出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理论逻辑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 强调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更是推动创新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背后能够体现出我国通过对外交往和合作, 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要素有效聚集。而现实逻辑则是结合全球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 梳理我国如何实现资源与要素的有效聚集, 这一系列的探索如何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为中国利用外部经济环境、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了清晰的理念指引与清晰路径, 指引我国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深入讨论这一重要论述的双逻辑必要性在于, 这不仅有利于理解我国开放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还清晰地梳理了我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把握机遇与挑战, 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对外开放; 习近平; 理论逻辑; 现实逻辑; 一带一路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7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 是一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不断演进的严密、详实的思想体系。讨论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要建立在时代背景之下, 实践路径的基础之上, 需要着重考察背后的历史哲学、辩证思维以及系统观念的演变过程。

(一) 开放理论的形成: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形成规律的深刻洞察, 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梳理与重新定义。这背后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不仅是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 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实践探索其背后开放本质的哲学回归, 包含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契合、对世界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顺应、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需求匹配。就开放理论形成的现实性而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的起点侧重于对现实中“为什么要开放”与“开放的历史方位”等问题的解答, 之所以说是“必然性”的重构, 并非是对以往对外开放实践道路的否定, 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对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核心逻辑、实现路径和制度体系进行优化、升级与完善。

第一, 中国的开放是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自觉。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提出“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导致落后”的重要认识。在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中表示, 纵观中华经济发展史, 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我们要在开放中学习, 尽可能防范和化解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道路。这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下我国面对封闭与落后的因果律作出的经验总结。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演进, 将历史地总结的经验上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趋势, 提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逻辑起点承认了开放的重要性同时, 向世界否定了任何形式的“孤立主

作者简介: 王飘怡(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通讯作者: 王飘怡

义”，确立了我国开放政策的长期性与根本性。

第二，中国的开放是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整体展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转向过程，从被动开放转向内因驱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要素驱动难以为继，中国的开放不仅是为了获取外汇、学习先进技术，更是为了倒逼国内改革、破解发展瓶颈。针对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在逻辑上确立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2]的双向互动观。其逻辑起点、核心在于开放下的“生存与发展”，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生存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

（二）开放理论的丰富：基于辩证法的“主动性”与“共生性”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的逻辑体系体现的是以辩证法的“主动性”突破局限，以“共生性”拓展边界，最终形成更具系统性、包容性的开放逻辑，这一逻辑与辩证法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就开放理论丰富的现实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丰富过程回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我国怎么开放”与“开放的价值指向”问题。其理论逻辑由“为内向外”的单向需求扩展为“内外联动”的系统布局，重点在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从被动适应规则转向主动布局与全球治理。这一实践过程中开放基本理念的变化与实践探索的进步，从逻辑上讨论表现出基于辩证法的“主动性”“共生性”双重特性。

第一，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的内因是根本动力。开放逻辑的“主动性”指的是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顺应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主动求变、破局升级，推动开放逻辑不断丰富，并将开放理念指导于现实实践。我国主动回应“大而不强”的发展瓶颈、国际逆全球化的外部压力，提出“制度型”开放，将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层面，拓展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丰富开放的内涵维度。“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以开放主动破解发展质量难题，让我国开放逻辑更具深度。除此之外，我国主动引领发展方向，主动优化内在结构。我国提出全球倡议，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主动搭建合作平台、完善全球治理，将开放逻辑从“单向收益”拓展为“双向赋能”，丰富了我国开放的实践道路。我国针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待升级等问题主动调整开放布局与格局，主动对接国际标准与国际规则，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将开放逻辑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调”，在空间和制度上丰富了开放内涵和具体内容。

第二，开放逻辑的“共生性”是指以辩证法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提倡打破孤立思维，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联系观拓展开放边界，让开放逻辑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辐射力。我国突破国际社会“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单一思维，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合作主张要素互补，将开放逻辑从“单向的输出或输入”丰富为“多元共生、利益共享”。我国建立起“内外联动”的系统思维，改变“国内”与“国际”的割裂视角，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国际循环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活力，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让开放从“外部补充”升级为“内外协同”，丰富了开放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我国拓展“多元合作”的合作思维，突破以往侧重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开放局限，主动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拓展新兴市场；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领域开辟开放赛道，形成“传统领域深化、新兴领域拓展”的多元开放格局，对合作对象、领域的拓展，让开放逻辑从“单一维度”丰富为“多元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演进中逐步涵盖更加广泛的利益支撑点，即现实中的利益相关方。

总体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丰富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从空间布局与价值共生两个逻辑维度展开，贯穿辩证法的内在要求，表现出“主动性”与“共生性”双重特性。这种双重维度表现为：一是从“点线面”到“全方位”的立体思维。我国突破简单的区域线性布局逻辑，建立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立体逻辑；二是实现利益共同体和零和博弈的对立统一，对义利观的重塑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逻辑，提出“正确的义利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确立“互利共赢”的逻辑前提，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开放过程中谁受益的伦理问题。在理论丰富的过程中，理论逻辑的演变核心在于开放中的主动与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论证了开放不是被动接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0-11-11(01).

受规则，而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的处理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美美与共。

（三）开放理论的发展：基于系统观点的“制度型”与“安全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持续发展，从逻辑变化而言本质上是系统观点的“制度论”与“安全性”的深度融合、动态适配的过程。系统观点强调有机整体的有序运转与风险防控并重，“制度型”开放为开放发展的道路提供结构化的升级路径，“安全性”则是为开放发展的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二者相互支撑、同向发力，其背后展现出我国开放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驾驭”演进。

第一，“制度型”是我国开放发展的结构化动力。哲学的系统观点认为，系统的发展离不开清晰的规则框架与协同机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中，“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解决了我国以往开放中“碎片化”“短期化”问题，让开放逻辑更具有系统性、稳定性与扩展性。我国推动开放发展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升级，形成整体合力。新时代“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标准等核心，通过外商投资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构建起崭新的制度框架，推动我国开放从“临时的红利政策”转向“长效的制度保障”，使开放更具有持续性。我国强化开放系统的“内外协同”逻辑，认准开放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核心实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效衔接，比如对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等，这种协同性推动我国开放从“单纯的对接外部”发展为“内外规则互融互促”，让开放更加高效，为开放发展拓展空间、深化层次。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深化，我国在开放发展的路径探索上逐步实现制度的“可推广性”，让开放发展逻辑突破地理的边界，从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点上创新”，推广为全国范围内的“面上实践”，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主张制度型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层面、深入到制度供给层面，让开放发展从“浅层次”向“深层次”延伸，覆盖更多核心领域。

第二，“安全性”是开放发展的底线支撑。哲学系统的观点重视“整体稳定”，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风险防控是开放系统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发展的整体演变中，“安全性”贯穿开放发展的全程。我国确保开放在扩大规模、深化层次的同时不偏离国家安全底线，为开放发展提供稳定环境。我国破解“开放与风险”并存的逻辑矛盾，开放程度越高，系统面临的内外风险就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核安全”，将安全性纳入开放的实践逻辑中，推动我国开放发展从“重发展速度”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实现安全前提下的有序开放。我国筑牢开放系统的“内部韧性”，系统的稳定依赖内部核心要素的安全可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守住关键领域底线，比如在科技开放中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在能源、粮食等领域保障供应链安全，避免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这种内部韧性的培养使我国开放发展从“依赖外部资源”转向“内外资源互补互保”，确保我国开放系统不因外部动荡而失衡。

总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呈现出极强的系统观点和底线思维，表现为制度深化、安全底线等方面的逻辑深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深入实践，我国的开放逻辑已实现了关键的跃升，发展为稳固安全的制度型开放；在高质量开放发展的同时，向安全开放发展要成效，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理论逻辑随着理论实践更加深化，分化出安全风险意识的支撑点，在逻辑上厘清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只有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才能在全球开放浪潮中站稳脚跟。在开放理论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理论发展的逻辑核心在于“高水平与安全”，论证了开放的深度与开放制度的紧密联系，开放的底气在于国内大循环的持续健康发展，开放可持续性在于开放发展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表现出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升华路径，其起点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开放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的问题，中间点在于基于全球视野与辩证法回答开放的“路径与价值”问题，至高点在于基于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解决开放的“质量与保障”问题。这一过程的探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运行与发展，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学观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家安全学说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不仅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指向。开放论述的现实逻辑的本质在于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如何通过开放这一“关键一招”来解决内部结构性失衡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现实逻辑在开放实践探索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动力重

构、路径跃升以及格局重塑三个维度。

（一）动力重构：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能

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起点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精准把握。过去我国的开放发展依赖“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在外，以及低成本要素驱动的传统开放模式，并且面临着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困境，因此，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起点是一场开放体系的动力变革与重构。

首先，我国积极面对当前国际背景中的复杂因素，以开放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明确了以开放促改革。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现象频发的现实状况，我国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国际经济合作，促成双边、多边合作的开放道路；以问题意识拓宽开放空间，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主动面对当前阻碍开放合作的风险因素，以开放促改革；从拓宽内部空间，优化内部环境到加强对外合作，我国在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发挥比较优势。针对国内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和市场分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外部竞争压力，打破利益化的藩篱。在实践探索上，我国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举措不仅为了平衡贸易收益，更是为了引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对于光电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言，这种开发实践的逻辑意味着我国必须与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锻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破要素制约。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发展的核心要素已从土地、劳动力转向数据、技术与高端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明确当前国内经济转型，我国经济从速度向质量的转变需要我国从单纯的“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我国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聚集，从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现实跨越。

（二）路径跃升：从“政策洼地”迈向“制度高地”的改革探索

自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之后，如何提高开放的水平，提升对外开放工作的质量以推动发展是新时代对外开放要解决的现实难题，因此，从“政策洼地”向“制度高地”的改革探索是我国开放发展现实逻辑中最具操作性的部分。在过去，我国的开放实践逻辑往往依赖优惠政策，以此构成“洼地效应”，将政策、资源、市场等汇聚出国内独特优势，制造集聚收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3]”，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逻辑强调通过规则、管理标准的现代化提升，构建国际合作的高地，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全面探索高水平开放道路，一步步打造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首先，我国在制度型开放上实现实质性的突破。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逻辑要求开放政策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国际竞争的焦点已经转向营商环境的竞争，因此，我国为建设更具效能更有前景的营商环境作出了实践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从上海自贸区的的第一张“负面清单”到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这一实践标志着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这并非我国对外开放实践探索的政策微调，而是行政权力与市场边界的重新界定，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 CPTPP（全面与进步太平洋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准则。

其次，我国加大服务业与资本市场的深度试水。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开放已趋向成熟，服务业与金融领域逐步实现现实增量，但是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仍需在对外开放的服务业、资本市场深入探索。这一层面的开放不再停留于货物贸易的通关便利化，而是深入到金融牌照、电信业务许可等深水区，体现了开放路径向产业链高端、价值链核心的延伸。从开放的实践逻辑上来说，我国突破了传统开放的表层局限，深入到市场规则、行业核心资质等领域。一方面是从“流程便利”到“资质平等”，为电信等领域服务资质扫清障碍，使外资不再是“边缘者参与”，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核心领域竞争。一方面是“从政策优惠”到“制度公平”，我国在金融领域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跨境服务领域不再通过正面清单限定外资经营范围，这种制度设定避免了政策依赖带来的要素流动不稳定问题，是我国开放从“政策红利型”转向“制度优势型”的关键。

（三）格局重塑：在大国博弈中构建“韧性与安全”的战略闭环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的严峻外部环境，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必须回答“如何在开放中生存”的问题。

首先，我国通过多元化布局以及和平协商的友好交往方式化解风险。为了规避单一市场依赖带来的风险，新

[3]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时代对外开放发展的现实逻辑表现出开放空间的多元平衡。“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多元化布局的有力实践，其逻辑底色是通过“空间、伙伴、领域、规则”的多元拓展，打破以往单一化的开放格局。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成功开辟了新兴市场，优化了贸易结构。“以他人之优势补我之劣势”^[4]，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优化布局，统筹资源，以主动作为构建多元支撑，开辟发展新空间。中欧班列的逆市增长、RCEP的生效实施，都在现实层面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构建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战略回旋空间。除此之外，“越是开放，越要注意安全”^[5]。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我国始终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在安全的基础上追求开放的可持续性，在开放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6]。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的发展必将寓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因此我国将以更加强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11-11(01). [2] NAGARAJAN V, PONYAVIN V, CHEN Y, et al.
[2]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88.
[4] 习近平.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 求是, 2025 (14).
[5] 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10-23(002).

The Dual Logic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Wang Piaoyi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is grounded in the reform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emphasizing that opening up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 crucial pathway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nation'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this theoretical logic reveals how China,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s forme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achieving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effective aggregation of innovative factors. The practical logic, meanwhile, addresses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y outlining how China has effectively aggregated resources and factors, and how these explorations have forged a distinctive Chinese path of opening-up practi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provides clear conceptual guidance and a distinct path for China to leverag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address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guiding the nation toward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necessity of thoroughly examining this dual logic lies not only in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in clearly mapping how China navigat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ithin globalization. This discourse offers robus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88.

[5] 习近平.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 求是, 2025 (14).

[6] 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10-23(002).